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魏朝勇 著

自然与神圣

——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魏朝勇 著

自然与神圣

——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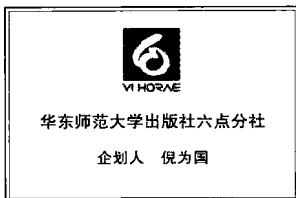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 / 魏朝勇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政治哲学文库 / 甘阳, 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617-7524-0

I. ①自… II. ①魏… III. ①伯罗奔尼撒战争(前
431~前 404)—战争史—研究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820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

魏朝勇 著

责任编辑 戴鹏飞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7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524-0/B·535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

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

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

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年夏

目 录

绪论 / 1

一、在诗与哲学之间 / 1

二、“永世瑰宝”及“修昔底德问题” / 13

三、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的现代解释维度 / 20

第一章 战争的必然与正义 / 28

一、战争的原因指向 / 28

二、必然与正义 / 41

三、法律正义的自然与神圣 / 58

第二章 伯利克勒斯“葬礼演说”的雅典稟性 / 74

一、“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75

二、雅典政制及其生活方式 / 81

三、私人的美德、光荣与城邦的公共事业 / 100

第三章 “弥罗斯对话”的迷思 / 117

一、从“公平”到“安全” / 117

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正义和利益 / 122

三、命运、希望和羞耻 / 135

四、必然的“言辞”及其迷思 / 148

第四章 西西里远征之后的修辞政治 / 155

一、演说辞的缺席和叙事的脱序 / 155

二、畏惧与审慎 / 161

三、恢复和“最好的政体” / 172

结语 / 181

参考文献 / 193

附录 / 201

一、《战争志》版本及研究文献举要 / 201

二、伯利克勒斯“葬礼演说”[译文] / 215

三、“弥罗斯对话”[译文] / 223

后记 / 229

绪 论

一、在诗与哲学之间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谁?霍布斯(Hobbes)曾提醒我们,有多个名叫修昔底德的人:法萨鲁斯(Pharsalus)人修昔底德,在《战争志》^①第 VIII 卷中他是雅典(Athens)利益的代理人(VIII·92);米利西亚斯(Milesias)之子修昔底德,普鲁塔克(Plutarch)的“伯利克勒斯(Pericles)传”对他有所提及,此人可能就是《战争志》第 I 卷中率舰援助萨摩斯(Samos)的修昔底德(I·107);阿里斯通(Ariston)之子修昔底德,来自阿克都斯(Acherd-

① 在本书中,修昔底德的著作统称为《战争志》(这个译名的首倡者为刘小枫先生,见其未刊稿《凯若斯》下册),不再沿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说法,原因见下文论述。另外,文中凡引用修昔底德《战争志》原文的,均由笔者根据 Smith 的希腊文—英文对照本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9)译出,并同时对照了 Hobbes 的译本 *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Vol. ix, ed. by William Molesworth, Aalen: Scientia, 1966)以及 Steven Lattimore 的译本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无论是《战争志》的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都将随文注传统章节码。

us)镇,是一位诗人,没有作品传世;《战争志》作者哈里穆斯(Halimus)镇人修昔底德,是奥洛鲁斯(Orolus)和荷歌西裴勒(Hegesypele)的儿子,与色雷斯(Thrace)王族沾亲带故,即便没写过《战争志》,也会因其贵胄显耀而闻名于世。^①

《战争志》作者修昔底德大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卒于公元前396年。^②他在书中很少提及自己。一开始,他只说自己是一名雅典人(I·1);伯罗奔半岛战争第二年雅典爆发瘟疫,修昔

① 参见 Hobbes, “Of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 in 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Grecian War*, Vol. I, trans. by Hobbes, p. xiii. 令人困惑的是,那个援兵萨摩斯(Samos)的修昔底德的身份向来有争议:

Smith 说:有人认为他可能就是史家修昔底德,有人认为他是米利西亚斯(Milesias)的儿子、伯利克勒斯的政敌,也有人认为他是来自阿克都斯(Acherdus)镇的一位诗人。参见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 I, trans. by Smith,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9, p. 194, n. 1.

但 Gomme 指这个修昔底德不是米利西亚斯的儿子,因为后者大概在两三年前就被放逐了,据马奇里努斯(Marcellinus,或写作 Markellinos)的意思,这个修昔底德也许是 Ἀχερδούσιος(阿克德修昔奥斯)或者 Γαργήτιος(高哥逊奥斯)。参见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9, p. 354.

Hornblower 则认为这个修昔底德不是史家修昔底德,因为史家修昔底德强调自己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已长大成人,大概年仅30岁左右,不可能10年前就担任了将军。参见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1, p. 191.

至于米利西亚斯的儿子、伯利克勒斯的政敌修昔底德,可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66页。

② 有关修昔底德的生平后人知之不多,其生卒年也有不少争议。稍详细点的资料可参见以下著作:

Hobbes, “Of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 Smith, “Introduction”, in Thucydides, Vol. 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9, pp. vii-xix; Grundy, *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 Vol. 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8, pp. 11-47; Finley, *Thucydid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3, pp. 3-35; Dennis Proctor, *The Experience of Thucydides*,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80, pp. 33-45; 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1.

底德未能幸免,身染疫病(II·48);战争的第八年,担任色雷斯地区的将军,驻守塔索斯(Thasos),因战事需要率舰船援救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可惜行动未果(IV·104—107);安菲波里斯战事失败后,遭致放逐并流亡异邦20载,这使他获得更多空闲时间探究战争进程(V·26)。从此,修昔底德由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军变成了战争的旁观者和记录者。

修昔底德没有为自己的战争“记录”(συγγράφειν)命名,标题“伯罗奔半岛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是后人的点睛。^①在后世的史家看来,修昔底德是“所有史家中最好的一位”。公元前一世纪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已暗示了这一点,别有心思地在古代史家与哲人、修辞家之间谈论修昔底德。^②

在某种“之间”讨论史家,大概始于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如其所言:

史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韵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韵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韵文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

① 参见 Finley, *Thucydides*, p. 3, n. 1. συγγράφειν 这个词在修昔底德原著中实为 ξυνέγραψε, 见英希对照本, Smith 翻译的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1, IV·104, 前揭。

② Dionysius 本人未必认可修昔底德是“所有史家中最好的一位”,就其语境而言,不过借鉴一种说法而已(参见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 Chapter 1, 5, 6, 7, 8, trans. by W. Kendrick Pritchet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5)。实际上,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只是记述了一场战争,就呈现希腊和蛮族的关联历史而言,他不如希罗多德(尤见 Chapter 5, 另参见 Hobbes, “Of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 前揭, p. xxiii)。有关希罗多德《历史》之目的,从其开篇的言论即可察得。希罗多德说他的研究成果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于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见氏著《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页)。

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①

亚里士多德的判断——“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给出了“历史”的位置:在诗与哲学“之间”。或者说,史家处在诗人和哲人“之间”。这个“之间”不是一种过渡,毋宁说史家不如诗人,更不如哲人。

亚里士多德或许想借“史家和诗人的区别”暗中调和柏拉图(Plato)的“诗”与“哲”的冲突,表面上却是针对史家来为诗人辩护。亚里士多德点了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名,但似乎更在意修昔底德,因为在那段话里他补充了一句——“所谓‘具体事件’是指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做过或遭遇过的事”^②。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时代,哪位史家详述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具体事件”?当然是修昔底德。^③

修昔底德讥弹用韵文写作的诗人,也睥睨用散文写作的编年史家。他申明:

无论如何,从业已援引的证据可知,凡是认为古代事件的状况与我的记述相当接近的人,他就不会出错;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1451b。中译见陈中梅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1451b·10。

③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谈到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时,指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史家”是“前现代意义上的史家”,而修昔底德可能就是这种史家(另外,施特劳斯又非常清楚修昔底德不是完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史家,见下文注释);同时还说“诗处在历史和哲学之间:历史与哲学分立两极”(参见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63, p. 142)。而我以为,就亚里士多德的表达修辞推测,或许也能说“历史处在诗和哲学之间:诗与哲学分立两极”。

没有比这些记述更可信的了,一方面,诗人(ποιηταί)只知吟咏歌唱,粉饰并夸大事件的主题,另一方面,编年史家(λογογράφοι)构织事件,是为了取悦听众而不是为了真实(ἐπὶ τὸ προσαγωγότερον τῇ ἀκροάσει ἢ ἀληθέστερον);他们的故事无法得到验证,大都由流逝的时光中寻找进入神话境界的途径,以致变得难以置信(I·21)。

修昔底德指摘诗人和编年史家缺乏“真实”,姑且不说编年史家,^①修昔底德对待诗人的态度和亚里士多德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毋庸讳言,修昔底德所指的诗人正是荷马(Homer)。修昔底德不相信荷马,只因他确信特洛伊远征根本没有荷马宣扬的那般伟大(I·10—11)?

在《战争志》第II卷中,伯利克勒斯的“葬礼演说”宣讲到:

我们将不需要荷马唱赞歌,也不需要其他诗人的歌颂,他们的诗篇可能令人欣喜一时,但他们臆想的事行蒙蔽了真实(II·41)。

如果伯利克勒斯的演说隐匿着修昔底德自己的认同,那么,修昔底德介怀于荷马的仍然是“真实”与“可信”。

在修昔底德之于荷马的态度中,可以体会一种新观念的生成。荷马代表着古希腊伟大的史诗传统。这一传统在修昔底德之前的伊奥尼亚(Ionia)史家(也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编年史

① 据 Gomme 讲,修昔底德之前的编年史家主要是指 Hekataios, Xanthos, Charon, Hellanikos, 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在希罗多德(Herodotos)之前就已出版,但对希罗多德有什么影响向来赋有争议。参见氏著,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p. 2, 以及 n. 1, n. 2。

家”)那里已经受到挑战。*ἱστορίη* (historia, 历史)一词是伊奥尼亚的产物,与自然研究相关,志在“调查”,蕴涵着自然科学精神。首个把 *ἱστορίη* 从自然转向“调查”人类生活和国家的人就是赫克特乌斯(Hecataeus,或写作 Hekataios)。赫克特乌斯的历史叙述混合了经验知识和逻辑假设,以及谱系研究和对神话学的理性批判。古老的史诗传统正是在这种混合的新观念中遭受动摇。^①

修昔底德不屑编年史家,在重视经验知识和祛除神话迷思的维度上,他还是承继了赫克特乌斯。^② 正如赫克特乌斯在著作《谱系》(*Genealogies*)中宣称:

我在这里所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记录,希腊人的传说很多,但在我眼里是荒谬可笑的。^③

修昔底德比编年史家尤进一步,为了表明接近“真实”,《战争志》的标记选用了 *συγγραφεῖν* (记录、志)一词,而非 *ἱστορίη*。^④ 实际

① 参见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82。关于 Hecataeus, 还可参见 Lionel Pearson, *Early Ionian Histori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pp. 25—106。

② 参见 Jaeger, *ibid.* 亦参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 Chapter 6。不过,修昔底德的记述摒弃“神话”,这与他不相信“神”是两个问题。霍布斯说修昔底德“一方面不迷信,一方面也不是无神论者”(参见 Hobbes, “Of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 p. xv)。

③ 转引自凯利(Donald R. Kelley):《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3页。

④ 柯林武德(Collingwood)指修昔底德写的是古希腊阿提卡(Attic)文,而不是伊奥尼亚(Ionia)文,所以当然不会使用 *ἱστορίη* 这个名词(参见氏著《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0页)。这种说法不足信,因为修昔底德著作同样有不少伊奥尼亚的元素。修昔底德应该是有意不用 *ἱστορίη* 这个词。根据古典学家默雷(Gilbert Murray)的证明,修昔底德其实是用“半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参见氏著《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01页)。

(转下页)

上,修昔底德从来没有说过叙述一个“历史”,*ἱστορίη* 这个词汇在其作品中全无踪影。^①

相反,希罗多德的“历史”就用了 *ἱστορίη*,这个词在他那里的意思即是“调查研究”。^② 希罗多德的风格杂糅了荷马和赫克特乌斯的两种传统。^③ 某种意义上,希罗多德的史著含有修昔底德所攻击的两大特点。恰在狄奥尼修斯看来,修昔底德轻慢希罗多德。^④

修昔底德是荷马的竞争者,甚至是“史家”的陌路人:他既非

(接上页注④)。此外,古典学家 Jebb 在讨论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看法时说过这么一句话——“狄奥尼修斯把更为夸耀的名号 *συγγραφεὺς* (记录者) 给予了伊奥尼亚的编年史家”(这些人要么生活在修昔底德之前,要么是比修昔底德年长的同时代人,不包括希罗多德——引注)(参见 Jebb, “The Speeches of Thucydides”, in *Hellenica: On Greek Poetry Philosophy History and Religion*, ed. By Abbott, London: Kennikat Press, 1880, p. 267, n. 1. 另见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 Chapter 5. 在英译本中只能见到作动词的 record)。从 Jebb 的语气看,伊奥尼亚的编年史家没有用过 *συγγραφεὺς* 这个词,是狄奥尼修斯把 *συγγραφεὺς* 这个称号“给予”(concede)他们的(且不说狄奥尼修斯的做法是否恰当),同时也表明 *συγγραφεὺς* 在“记录”或“探究”的程度上要比 *ἱστορίη* 更高,而不是单纯的方言差别。

- ① 参见 Michel Palmer, *Love of Glory and the Common Goo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 Inc. 1992, p. 7, n. 32. 亦参见施特劳斯(Leo Strauss),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 ② 参见 Seth Benardete, *Herodotean Inquiries*,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9, p. 1.
- ③ 参见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pp. 382, 383.
- ④ 参见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On Thucydides*, Chapter 6.

古典学家 Cornford 也认为《战争志》第一卷中有关拉克岱蒙人一段史实的评论(I·20)是不点名批评希罗多德(参见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5, pp. 74, 75)。可对勒希罗多德《历史》VI·57, IX·53。但据 Gomme 的理解,修昔底德从希罗多德停止的地方开始他的历史记述,乃是表达他对希罗多德的礼赞(参见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I, p. 1)。